

## 酈道元《水經注》異事書寫與引述文獻的新詮釋

朱先敏

### 摘要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翔實的考證、豐富的引述和獨特的形式成為地理志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人常據此書研究地理變遷，並探討其政治意圖。在這樣的閱讀框架下，實地考察和文獻保存成為《水經注》最重要的價值所在。本文則嘗試挖掘《水經注》的虛構面和敘事性，將「異事書寫」和「引述文獻」置回文本語境，重新探討它們的意義。發現看似追新好奇的異事書寫其實意圖以人情交流與讀者共鳴；看似原文照搬的引述文獻其實仰賴讀者的先驗知識，作者才得以靈活地依照地景挑選、重組、刪修歷史事件。《水經注》解消了〈禹貢〉以下任土作貢的地志結構，以河水流經的地景為順序介紹沿岸掌故與景象。上述的變化和酈道元試圖建構的地志傳統有關，指向的是更寬廣的預設讀者，而不再只為統治者服務。

這群有共同知識和興趣的地志讀者，讓酈道元得以凸顯地理景色予人的趣味性和美感體驗。這影響了他對異事的敘事經營與鋪陳，也決定了引述文獻時如何打散與重組。如此一來，《水經注》別具一格的書寫形式與內容就有了地志發展史上的解讀空間。

關鍵詞：《水經注》、地理志、讀者、虛構、敘事

---

2020/06/24 收稿，2021/01/11 審查通過，2021/02/20 修訂稿收件。

\* 本文撰寫、修改期間承蒙鄭毓瑜老師、胡曉真老師和廖棟樑老師的啟發與指點，也特別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在此謹申謝忱。

\*\* 朱先敏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

DOI:10.30407/BDCL.202112\_(36).0003

##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Strange Writings and Quotations in Li Daoyuan's *Shuijing Zhu*

Chu Hsien-min

### Abstract

As a commentary and a gazetteer, *Shuijing zhu* (*Commentary on the Waterways Classic*) is usually seen as a record of changes in geography in medieval China and studied for this purpose and political intentions implied therein.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 *Shuijing zhu* lies in its field studies and preservation of texts. However, by focusing on strange writings and quotations in the book, we can see how the author manipulates these for his specific purpos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and fictional aspects of *Shuijing zhu*. When analyzing anecdotes and quotations in the context, I find that Li exaggerates conflicts and emotions among different people in anecdotes. Also, Li selects, abbreviates and reconstructs historical fac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andscape, for he knows the readers already hav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ories. As a result, Li deconstructs the genre established by “Yu Gong” in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uijing zhu* is no longer a gazetteer to help emperors rule the country, instead, Li tries to find, to cultivate and to summon a group of readers who share interests in appreciating sceneries.

With these target readers who have same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interests in mind, Li emphasizes the delight and aesthetic feelings in the sceneries. In so doing, Li manages to narrate strange stories, and reconstruct the quotations. The

---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Trend’s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Lecture” 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reative writing style and content of *Shuijing zhu* therefore allow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writings.

Keywords: *Shuijing Zhu*, gazetteer, reader, fictional, narrative

## 一、前言

生活於西元 5、6 世紀之交的酈道元 (?-527)，在正史裡僅有《魏書·酷吏列傳》裡短短數段的生平，留下「素有嚴猛之稱」、「時論薄之」的評語。<sup>1</sup>連他唯一流傳於世的鉅著《水經注》究竟定稿於何時、為何而作？都沒有留下紀錄。<sup>2</sup>如果沒有《水經注》，酈道元可能只是北魏千百個官員中評價比較差的一個，但這部資料翔實、形式卻特殊的地理志不但成就了酈道元的價值，還成為後人窺探他的窗口。《水經注》是一本極具代表性的地理志，有別於以州郡縣畫分卷次的常見形式，酈道元選擇了為不著撰人的小眾文本《水經》作注。他的注文不僅是對《水經》的解釋，更補充了豐富的人文與自然地理知識。他以流暢的文字將注解、引文、考證、描寫揉合在一起，有時甚至難以區分這是引述的文獻抑或酈氏的創作。他更在客觀知識的鋪排之間，保留許多徘徊、追索、克難的身體感知，以及悵惘、憂傷、悲壯的情感蕩漾。

為什麼《水經注》和其他地理志如此不同？受限於酈道元個人史料，後人無從考察他真實的著作意圖，卻也因此開拓了《水經注》「寫了什麼」、「為何這樣寫」的詮釋空間。早期的研究依循著以地理志作為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的功能，<sup>3</sup>擷取《水經注》寫景、志怪、奇聞的片段，探討酈道元為讀者提供了哪些類別的材料。<sup>4</sup>而《水經注》大篇幅的雕山鏤水，

<sup>1</sup> [北齊]魏收著，楊家駱主編：《魏書·酷吏列傳·酈道元》(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 89，頁 1926。

<sup>2</sup> 陳識仁認為酈道元注《水經》應該在延昌 4 年 (515) 東荊州刺史任內被彈劾免官之後、正光 5 年 (524) 起復為河南尹之前。然而陳識仁也注意到趙永復的研究，認為酈道元賦閒時期並沒有長達 9 年。因此《水經注》確切的撰著時間還沒有定論。參陳識仁：《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頁 97-98。

<sup>3</sup> 見 Yu-yu Cheng, "Text and Commenta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 ed.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3-131, Michael Nylan 稱之為 "guidebook," 見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 Alan K.L. Chan and Yuet-Keung L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p. 64。

<sup>4</sup> 范文瀾、鄭德坤、任啟珊都曾收錄、整理過《水經注》裡的寫景、記事、奇聞材料，參范文瀾：《《水經注》寫景文鈔》，《范文瀾全集》第 6 冊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任松如編：《《水經注》異聞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年)；鄭德坤：《《水

可視為山水散文發展後進入北朝的一道伏流，其書便有置放在南北朝山水文學的框架下討論的價值。<sup>5</sup>而當《水經注》的文學成就為人所關注，一本地理文獻、一本經注「自撰」與「他說」的界限在哪裡？如此便引發了下一階段的問題：酈道元銘刻山水、傳情寄物的文字功力和他所引述前代地志之間的相承關係。<sup>6</sup>

《水經注》作為一本首尾俱足、環環相扣的著作，其意義除了各類材料在不同文類上的貢獻，也受到著作意圖的影響。水，是生活、耕種、開發的必須，也是前工業時代重要的力量來源，對「水」的關注或許導因於人文關懷，是酈道元闡發治世理念的一部「子書」。<sup>7</sup>除了悲天憫人的情懷，也可能導因於對政府力量的歌頌。酈道元願意標舉的地名多為秦漢時期的重鎮、遺跡和遺址的選擇則顯露出對昔往榮光的追憶。他的選擇讓人聯想起在北魏對漢代遺澤的繼承、對於統一帝國的追懷。特別是酈道元筆下將當代與黃河強力結合，這顯然具有以「天下」為框架將現存和往昔統合的意圖。<sup>8</sup>雖然如此，《水經注》裡不只記載人為的建築、郡縣、界域，有別於前代地志的特點在於酈道元受南朝接觸自然、遊賞山水的好尚影響，強調的是自然地理（environmental）而非政治地理（political）。因此《水經注》是以自然的河道、而非人為的郡縣為架構。《水經注》象徵的或許是一個更

---

經注》故事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胡寶國則將《水經注》視為一種獨特的地志類型，與州郡地志並列討論，參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59-185。

<sup>5</sup> 將《水經注》置於山水散文的框架下，與南北朝其他散文作品進行比較的研究，參李嘉言：〈北朝的三部散文著作〉，《開封師院學報》1962年第1期，頁112-118；譚家健：〈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文學遺產》1982年第4期，頁1-11；杜培響：〈從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風的融合——以《水經注》和南朝山水小品為例〉，《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頁96-99。

<sup>6</sup> 鮑遠航認為談論《水經注》寫景文字時，不應該將其視為酈道元個人的天才煥發，而應該追索魏晉南北朝地志景物描寫的傳統。他比較了中古輯佚地志和《水經注》，指出酈道元的寫作技巧大多前有所承，而且《水經注》大量徵引前代的地志文獻，也影響了全書的文字質感。參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sup>7</sup> 張蓓蓓分析酈道元注疏內容所反映的人文精神，文中特別標舉出作者藉記錄水利設施所傳達的經世濟民思想，以及引用志怪故事所寄寓的道德教化意義。參張蓓蓓：〈由《水經注》看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成大中文學報》第29期（2010年7月），頁23-50。

<sup>8</sup>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pp. 64-69.

多元、具地方性、去宮廷中心化的地理概念，甚至能以此解構唐代編纂《隋書·經籍志》以降對「地理書寫」這種文類的想像。<sup>9</sup>

不論是對材料類別的辨析、從山水散文的框架切入，或者對或政治、或自然地理等著作動機的解讀，各類詮釋角度最終應該指向的是酈道元對地理志史明確的改寫意圖。從〈《水經注》序〉來看，酈道元深入理解了前代地理志的形式和內涵，並建構了包括《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的地志傳統，再打破、解構。他編寫《水經注》的方式對既有的文類傳統進行有意識的改動，使得讀者不只能從《水經注》裡得知許多地理知識，更窺見了酈道元作為書寫者在地理紀錄上的介入和能動性。經由《水經注》可以看見書寫者通過人類行止使地景描寫動態化，地理書寫在數據和陳述上具備了情感的號召。《水經注》特殊的書寫方式讓人開始反思：地理志該是什麼樣子？而後人該如何解讀酈道元藉由《水經注》展現的地志書寫新可能？<sup>10</sup>

## 二、地志的新方法：解消「作貢」與讀者轉向

地理書寫究竟應該生長成什麼模樣？不僅當代學者持續的反思，早在西元5、6世紀，北魏的酈道元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在酈道元生活的時代，地理學的概念將開始萌芽。《尚書·禹貢》以山川為隔、擘畫九州之舉，由《漢書·地理志》繼承、並酌參當代風俗志；到了魏晉，各類地理學著作才開始百花齊放。不同類別的地理書寫大都從魏晉開始發展，且與時人的需求密切相關。比如魏晉之後門閥興盛，文人喜作別傳與各地耆舊傳，方志與風俗傳因而成為地理志一大宗。而異物志、風土記、山川圖記的興起，也與士族南渡後探索異地的興趣有關。全國地理總志更是在西晉初年大盛，不但數量甚多，而且後出轉精、卷帙浩繁，為唐以後地理總圖和一

<sup>9</sup>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s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2014), p. 54.

<sup>10</sup> 人文地理學者早已開始關注地理學資料累積之外的各種書寫可能性，如段義孚曾試圖叩問地理著作的內涵：除了地圖、資料、描述和分析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可能？「我們是否能夠據理力爭？」段義孚這樣問：「既然人類生活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由激情所驅動——由一種知其不能為而為的慾望所驅動，那麼我們需要浪漫主義地理學嗎？」參〔美〕段義孚著，趙世玲譯：《浪漫主義地理學：探索崇高卓越的景觀》（臺北：立緒出版社，2018年），頁10-11。

統志的內容體例定下基礎。<sup>11</sup>酈道元雖然生長於北方，卻也充分掌握了南朝地理志的發展。《水經注》引述的文獻兼及南北，不論風土記、遊記、異物志、耆舊傳都成為了酈道元「廣布前文」時的養分。但在著手進行《水經》的注解之前，酈道元也有作為一個北方文人需要面對的歷史情境。

包括著名的《水經注》學者陳橋驛在內，許多探討《水經注》撰著動機的研究都很重視南北對峙的政局，他們認為這是影響酈道元書寫內容、體式的主要因素。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經」揭櫫酈道元並未親身前往南方，而是以既有的地理文獻充作南方水流的紀錄開始，後人就以濃烈的政治意圖去解讀《水經注》對南朝治下水域的記載。<sup>12</sup>比如陳橋驛便基於「納入南方河道」的安排將酈道元視為愛國者，認為酈道元用《水經注》寄託了孝文帝（471-499 在位）未竟的志業，提供將《水經注》視為北魏理想版圖紙上重現解讀視角。<sup>13</sup>劉苑如注意到敘事和語調的影響力，透過對稱謂名號的詮釋以及對酈道元序言的解讀，指出酈道元的引述和校證是一種「反空間的佔領方式」，以糾正、貶抑南方地理志作者來取回「紙上的空間權力」。<sup>14</sup>這些討論考掘出政治性對《水經注》或隱或顯的影響，彰顯了地理志傳統上對大一統的預期以及對「實地考察」此一書寫取徑的肯定。除政治上的解讀外，《隋書·經籍志》對地理志的彙整還顯示出兼及各地的地理總志除了仰賴實地考察，也倚靠大量的文獻積累：

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sup>15</sup>

<sup>11</sup>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頁129-195。

<sup>12</sup>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四十卷》，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二·河渠》第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卷69，頁1489-1490。

<sup>13</sup> 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2。

<sup>14</sup> 劉苑如：〈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9期（2016年9月），頁26-33。

<sup>15</sup> 〔唐〕魏徵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經籍志二》第2冊（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3，頁988。

《隋志》羅列了從上古時期到隋代的地理記載演變，從先王時出於統治需要的統計數字，演變到中古時期動輒百卷的大部頭叢書，演示了兩種途徑：若是官方編纂，則分門別類、層層彙報，如：先王時期和隋代；而若是私人撰寫，則需要借助前人的文獻。因此，樂於踏察如司馬遷（西元前 145-?），也無法普查全國地理概況，只能記載河渠之事；典正客觀如班固（32-92），也必須引述朱贛（?-?）的《風俗記》，才能獲得更全面的資訊。<sup>16</sup>而不論是陸澄（425-494）的《地理書》、任昉的《地記》或顧野王（519-581）的《輿地志》，由於「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的緣故，<sup>17</sup>都只能統合、彙整前人的著述。通過《隋志》對地理志傳統的辨析，酈道元述及南方和塞外時引述文獻合乎時代特色，對北方河流與沿岸地景的考證反倒才是具有個人性的書寫手法。

由此可知，南北對峙的政治現況固然是酈道元生存年代的一件大事，在描摹疆域、述數郡縣的同時，也無法擺落政治觀點和立場的影響，但卻未必是導致《水經注》獨特體式的唯一理由。有學者便從北魏的政治氛圍切入，將崔浩國史之獄視為影響《水經注》的主因。陳識仁認為，酈道元注《水經》受到了崔浩（381-450）國史之獄的影響。當著史已經成為可能帶來殺身之禍的危險事業，撰著地志成了酈道元可以表達心志又能避禍的選擇。陳識仁對於《水經注》著作動機的解讀，引發田餘慶進一步探討北魏皇室對於「國史」避諱的原因。田餘慶更以鄧淵（?-403）在道武帝（386-409 在位）時受命編纂《代歌》、《代記》，最終也莫名被牽連判死說明：編史的危險是隱隱罩在北魏士人心上的陰雲。<sup>18</sup>雖然陳識仁和田餘慶論據翔實，但崔浩之獄的真正原因在歷史上並沒有定論。<sup>19</sup>而且地理志長期以來便與歷史

<sup>16</sup> 「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參〔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下》第 2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卷 28，頁 1640。

<sup>17</sup> 〔唐〕魏徵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經籍志二》第 2 冊，卷 33，頁 988。

<sup>18</sup> 陳識仁：《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頁 11-84。田餘慶考證鄧淵是《代歌》的搜集整理者、《代記》的書寫者，因為兩者歌、史之間的文體差異，使得源於《代歌》的《代記》受到當權者疑慮，使鄧淵成為國史之獄的第一個犧牲者。田餘慶：《拓拔史探（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217。

<sup>19</sup> 如：何德章便引高允（390-487）對崔浩史書的嘉許反駁崔浩因著史而死的說法，認為崔浩真正的死因是過於激進地提倡漢化而招致反撲，參何德章：〈北魏前期歷史與崔浩「國



難以分割：早期地理志的代表，並為酈道元多番引用的《漢書·地理志》就是一篇史書中的地理紀實，地理志在文獻分類上也多歸於史部。即使到了地志大行其道的魏晉南北朝，倉修良也注意到地方歷史和地理書寫在地方志傳統中總是不停拉鋸。常璩（約 291-361）的《華陽國志》乾脆依卷次畫分，將地志和傳記結合在一起。<sup>20</sup>因此，如果僅僅是將書寫的體式從史書改為地志，就真的能讓地理書寫不成為歷史的附庸、不觸及國朝著史的雷區嗎？「後國史之獄」的陰影恐怕未必是酈道元選擇撰著地理志的主因。

政治性的解讀一直是《水經注》接受史上一個重要的詮釋視角，但如果只以大一統的角度詮解此書，很難解釋為什麼酈道元要將書寫的範圍擴及域外，例如：卷 14〈涇水注〉寫到朝鮮半島、卷 36〈溫水注〉、37〈葉榆河注〉、〈浪水注〉寫到中南半島，卷 1〈河水注〉更幾乎將所有的篇幅用在了印度。<sup>21</sup>在結構上，《水經注》更解消了〈禹貢〉以來「任土作貢」的架構，<sup>22</sup>使得政治性不再是地理志書寫者唯一的目標。陳識仁爬梳地學發展的淵源，指出從劉向（西元前 77-西元前 6）、劉歆（?-23）父子將圖書進行分類時就把地學圖籍拆為術略類和兵書略，並由此推論漢代地學基本上是依附在堪輿相法和兵家之下，具有相當實用的統治目的。自此之後一直到隋代，地理志大體維持著類似的形式和功能，未能發展成獨立的學科。<sup>23</sup>陳識仁雖然勾勒了漢隋之間地學發展的大致走向，也指出南北朝地理書的勃興，但他對此的解釋仍是人們流徙因而與新地區碰撞產生對新環境的新鮮感。<sup>24</sup>這樣的解釋適用於山水詩、散文、遊記等一系列新興文體，無法看

---

史之獄」，收於胡阿祥等：《魏晉南北朝十五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 80-81。聶早英則認為崔浩族誅集中反映了北魏前期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統治階層內部的爭鋒，此一事件主要目的是要震懾漢人，同時緩解拓拔貴族的憤懣、保護鮮卑貴族的特權，參聶早英：〈北魏前期的漢人士族與拓拔統治者〉，收於劉心長、馬忠理主編：《鄴城暨北朝史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278-279。

<sup>20</sup>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93-96。

<sup>21</sup> 陳橋驛歸納《水經注》裡述及域外的段落，將酈道元的域外地理志分為「曾受中國管轄」和「未曾受中國管轄」兩類，但只強調酈道元介紹少數民族的貢獻，將中國統治雲南、貴州乃至越南中北部視為既成事實，對於印度、柬埔寨等地則不多談，參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熱帶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兵要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域外地理〉，《《水經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138-148、177-194。

<sup>22</sup> 不著撰人：《尚書·禹貢》，《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開明書店，1991年），頁 5。

<sup>23</sup> 陳識仁：《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頁 133-136。

<sup>24</sup> 同上註，頁 137-141。

出地理志的特殊性。而在舉出南朝地志大量撰寫流傳以證實新環境的影響同時，忽略的是北方地學的發展，以及《水經注》的獨特形式與價值。

與前代的〈禹貢〉、《漢書·地理志》、時代相近的殷野王《輿地志》對照，《水經注》最大的特色在於酈道元消除了「貢」所寄託的從地方往中央匯聚的概念。不論從《隋書·經籍志》編列的地理志書名或〈《水經注》序〉自言的傳承，可知《尚書·禹貢》實是南北朝文人對地理志想像的緣起。〈禹貢〉所揭示的「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的撰注背景，<sup>25</sup>顯示出一種天下平定、由共主分派規畫的地理圖景。而各地進貢不但是臣服的象徵，也是中央藉此瞭解地方差異的契機。到《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則以「濟不通」、「旁行天下」點明黃帝之所以能畫分行政區域，是因為全國各地已經交通無阻、為黃帝一人所控制。而在春秋戰國的大亂之後，是倚靠「秦遂并兼四海」、「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掌握了唯一主權之後，漢代繼承、稍有損益，才有班固所記錄的〈地理志〉。<sup>26</sup>可見〈禹貢〉和《漢書·地理志》以州郡為架構，其前提是權力的集中、國土的統一和作為分類者的君主所掌控的絕對主導權。到了南朝的《輿地志》，作者顧野王依然承襲著這套由中央朝向地方、分州畫界的架構，可見權力關係作為地志記載的核心，直到中古時期依然為撰注者所接受。<sup>27</sup>

這一套由中央的集中權力、畫分國土、調查風俗物產的架構，在《水經注》的序言裡就被打破。〈禹貢〉對各地貢物的紀錄一如《漢書·地理志》、《輿地志》對各郡縣風俗、物產的紀錄，體現了明確的主／從、中心／邊緣、常／異的觀看視角。酈道元卻沒有與同時代的顧野王，以及之後傳承《輿地志》的《括地志》、《元和郡縣志》選擇一樣的進路。酈道元的序言從「水流無所不至、無所不潤」的特性寫起，<sup>28</sup>而《水經注》更以河道為架構，讓所謂中央和中心消散在蜿蜒周折的渺茫水域之間。《水經》原為專記

<sup>25</sup> 不著撰人：《尚書·禹貢》，頁5。

<sup>26</sup>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第八上》第2冊，卷33，頁1523。

<sup>27</sup> 〔南朝陳〕顧野王著，顧恒一、顧德明、顧久雄輯注：《輿地志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sup>2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

河道流向的著作，酈道元卻在序中明言將《水經注》納入〈禹貢〉以降，以統治為目的的地志傳統。如此一來，經文蜿蜒的河道流向就不僅是對「水域」的如實記載，而是與沿岸的地景、掌故一同構建成一處又一處的「地方」。因此，當一條黃河，先是述及印度，再繞回西域，最終通向長安，進入中原再奔流入海；當講述三峽一帶長江之後，又順流談及流經雲貴、中南半島的溫水、葉榆河，之後又繞回滋養湖南一地的資水、湘水時，讀者除了能看見依循經文架構後的地方論述如何解消主與從、中心與邊緣的區別，更看見酈道元跳脫經文框架以外的創發。比方說，酈道元花費大量篇幅記載《水經》書寫範圍之外的印度；比方說，他注解洮水流入黃河的經文時，還補上了洮水的源頭、流向和沿岸風光。此時再讀〈《水經注》序〉裡「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對河水能打破界限的描寫，<sup>29</sup>就不僅是召喚撰注《水經》的合理性，更是對於變革地志體式的解說。序文接著延伸到歷來地理書寫的不足：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sup>30</sup>

這一段對於前代地理志的臧否並未按照時間線排序，否則作於東漢的《漢書·地理志》不應該排在《尚書·禹貢》、《禹本紀》、《周禮·職方》之前。同時，這樣的排序也打破了經書、聖人之言在最前的慣例，因此，記載奇聞怪談的《山海經》（《大禹記》）和史家所撰的《漢書》放在段首，《尚書》和《周禮》兩本經典卻置於其後，中間還夾著《禹本紀》。由酈道元的點評可以看出，這些地理著作的分類和排序依照的是它們各自的形式。因此，總載各地的《山海經》和漢《志》在最前面，它們的缺點在於各地都寫到

<sup>2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1。

<sup>30</sup> David Jonathan Felt 以「注山海」的描述、「《大禹經》」的異文、《山海經》的形式、《水經注》對《山海經》的引用次數，以及歷代目錄將《山海經》列入地理書中等面向，論證此處《大禹記》指的是《山海經》，參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s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115。而卷39〈廬江水〉注中也有「按《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的句子，可作為酈道元以《大禹經》（記）稱《山海經》的旁證，參〔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1；下冊，卷39，頁3260。

了，內容卻不詳備，以及簡明記載各州風物，卻僅限於漢代疆域。以「貢」為核心概念的〈禹貢〉、《禹本紀》和〈職方〉為一類，缺點在於太過簡略。描繪城市的京都賦也是一類，這類作品因為描寫範圍僅限數座城池，不能充分表達地理志的意旨。《水經》又是一種地志形式，雖然大致寫到每一條河流，卻沒有注意到河岸景物和河道之間的聚和分。由酈道元對地理書寫的分類，可以看出他已經建構出了地理學的系譜，打散經典、史書、辭賦、地理志各個領域，依照地理志的體裁差異重新編列。甚至為地理書寫歸納出既周且備、又簡、還能宣意又旁通的撰著標準。

接下來他對焦了兩種地理書寫的使用者：「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建照，縱彷彿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sup>31</sup> 依照既有文獻尋訪遺跡的人，得到許多轉述、轉寫的疆土畫分之說；親身遊歷的人，則很少能以實地驗證既有的舊說。這樣缺失讓他感到惶惑不安，也促使了他寫一本自己的地理志。以這段文字和〈禹貢〉、漢《志》相比，會發現酈道元對話的對象改變了。他不再歌頌帝王分疆裂地的功績，轉而朝向「尋圖訪蹟」和「涉土遊方」的人，朝向一群和酈道元自己一樣閱讀、使用甚至撰寫地理志的人。與上一段重新編排過的地理著作合併觀看，酈道元從既有的書籍分類畫分出一類屬於地理書寫的門類，不再設限於僅供帝王、中央的統治參考，轉而面向更廣泛的讀者群進行對話。

由此可見，當酈道元消除了地理志「貢」的架構，更大的意義在於將地理志的預設讀者從執政者轉向所有使用地志、書寫地志的人。「任土作貢」、風俗民情的記載原先是為了中央執政所需，具有明確的實用價值。然而當地理著作成為一種專門的書寫類別，有一群不為中央與帝王、不為統治和實用而書寫的作者之後，地理書寫該容納的是什麼，因而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間。當地理志從術數、兵事、史書中被拆解出來，當酈道元吸納了南朝風土記、山水詩文、遊記裡那些接觸新環境時產生的驚訝、喜悅和感嘆，地理志的內涵因而變得更加純粹，同時也更加豐富。考諸《水經注》，酈道元的地理書寫不僅是地景與風土的紀錄，更注意人與自然互動下產生的喜悅、悲痛和追憶，以此誘發閱讀時的同情共感與愉悅經驗。在前人已經注意到《水經注》在自然地理上的成果之後，需要指出的是人類的事蹟、情感與互動也作用在山水自然之間——正是《水經注》裡對人類行止的記

<sup>3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1。

載豐富了每一處地景的意義。比起鑑往知來、因地制宜的實際需求，《水經注》更凸顯了人群之間的愛與恨、合與分如何讓單一景點跳脫出來，展現被書寫、被記憶的價值。人類在自然之中的生存遺跡在酈道元筆下以歷史掌故、奇聞軼事等形式出現，讓地理書寫而非歷史事件在地志裡占據主導地位，翻轉了地理與歷史在地志史上的主從關係。同時，酈道元也通過對人們舉措的刻畫和渲染引發讀者情感的共鳴，讓地理志不僅僅是數據、物產、史實，更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不斷互動間所形成的動態記錄。這種嶄新的設想和書寫方式具體而微地展現在《水經注》最後1卷，〈漸江水注〉裡提到定陽溪的景色：

其水分納眾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sup>32</sup>

酈道元從河岸的景色寫起，以悉生對雜以、以芳枳、木連對霜菊、金橙，短短兩句，有姿態、有香氣、有顏色。讀者的視線隨著文字從岸生植物移到沙石和水波，字裡行間有白沙如雪的畫面，也有水流拍打石頭的聲音。這段描述以「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將前述的景色歸結到山水給人的趣味，以及景物與人情之間的呼應和迴響。作者想要藉由對山水的描摹刻畫帶給讀者賞心悅目之效，也注意到情感在地景書寫與閱讀時的作用。由《水經注》解消作「貢」的新方法和面向地志書寫者等新讀者兩個角度，重新審視《水經注》的異事書寫和引述文獻，或許就有了追新好奇和注疏範式以外的解讀空間。

### 三、情感與異事：人與地景的互動與衍義

異事書寫在《水經注》裡出現並不奇怪。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1959-）在研究異事書寫（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時分梳唐前異事書寫有兩類從戰國到漢代發展而來的淵源，一是以地理為中心，描述生長於特定地點的奇異神人、動植物；二是以人物為中心，記錄神話人物、智者、統治者、巫師、奇技者的事蹟。<sup>33</sup>雖然地理書寫和異事紀聞的關聯如此

<sup>3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40，頁3293。

<sup>33</sup> Robert Ford Campany,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99.

源遠流長，康儒博卻特別將《高士傳》、《水經注》等作品列為異事書寫的邊緣文本 (marginal text)，因為它們雖然記載大量的奇事，卻極力排除對精神世界的刻畫和渲染，有意識地以記載地理事實為書寫目標，區分自己的作品和志怪的差異。<sup>34</sup>通過對作者意圖的分疏，康儒博研究的範疇雖然涵蓋了諸如《臨海異物志》之類近似於地志的著作，卻明確地將《水經注》畫分在異事書寫乃至於志怪小說之外。當《水經注》的異事書寫不被視為好奇、志怪，它的解讀角度或許與南北朝風土記、方志的撰寫特色有關。一地的奇風異俗、傳聞掌故，從南北朝開始就成為方志、風土記中的重要材料。例如：吳徐整 (220-265)《豫章舊志》稱漢武帝 (西元前 140-西元前 87 在位) 南巡親眼見到於廬山飛升的廬俗 (?-?)，因而封廬俗為「大明公」，享祭祀；袁山松 (?-401)《宜都記》稱卿下村有神龍，人民求雨則以茵草投淵，龍怒則應時天雨；《華陽國志·蜀志》則記錄了杜宇 (?-?) 禪位於宰相開明 (?-?) 後化為杜鵑、蜀地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等奇事。<sup>35</sup>六朝地志擴充了「風俗」的定義，容納進了常理不可解的異事，這樣的好尚曾為唐人所駁斥，例如：劉知幾 (661-721)《史通·采撰》稱郡國之記、譜牒之書有「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之弊、<sup>36</sup>〈雜述〉稱這種作為是因為「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導致「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sup>37</sup>顏師古更稱南方地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sup>38</sup>胡寶國據此類評價論證，唐人對北方兩部地理鉅作闕駟 (?-?)《十三州志》和酈道元

<sup>34</sup> Robert Ford Campany,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31.

<sup>35</sup> 《豫章舊志》已亡佚，散於注疏類書中，廬俗故事於《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和《水經注》可見，參〔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規箴第十》（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572-573；《宜都山川記》已亡佚，龍怒則雨故事見於《太平御覽》和《水經注》，參〔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淵》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70，頁330；《水經注》內容各參〔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39，頁3258-3260、卷37，頁3060；杜宇、五丁力士故事參〔東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727。

<sup>36</sup>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08-109。

<sup>37</sup> 同上註，頁256

<sup>38</sup>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上》第2冊，卷28，頁1543。

《水經注》的評價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為前者著重考據實證，後者則多引南方地志。<sup>39</sup>因此，唐人對《水經注》頗多批判。從風土記收載奇聞的特色，到唐人的評價，再到當代學者的歸納，可以看出當人群流動與新環境碰撞後，地志、風土記裡便有了新的內容。熟稔於南朝地志，也引用過《豫章舊志》、《宜都記》和《華陽國志》的酈道元因此吸收了這類型的文獻材料，將各地傳聞異事寫進每一處河流流經的地景。

當異事成為《水經注》撰著風土時的材料，實用性顯然就不再是這本書介紹一個地方時的唯一考量。所以讀者會發現〈禹貢〉傳承下來的物產、交通、運輸不再是酈道元書寫的重點。比如，論及古夜郎國、漢代的牂柯郡時，司馬遷的〈西南夷列傳〉重點在於漢代如何與夜郎國產生聯繫，如何從認識、交通到征服。因此「枸醬」成為這段歷史的關鍵：漢將唐蒙(?-?)在南越吃到了大漢首都長安都未曾見過的「枸醬」時，他感到驚訝，進而好奇，於是追問，然後從這個原先不通來往的、產「枸醬」的夜郎，發覺了一條可以攻下南越的河道。<sup>40</sup>然而在《水經·溫水注》裡「枸醬」被隱而不談，唐蒙開牂柯一事重點成了竹王傳說：

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漢，氏竹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sup>41</sup>

豚水是夜郎的稱呼，在漢文化裡這條河叫作鬱水。竹王傳說的前半是一個典型的降生神話：一個奇異得孕的婦人產下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孩子。竹王長大後，不但雄踞豚水流域，還能行神蹟：承裝他的竹筒隨手一扔就能成林、口渴了拿劍敲擊石頭就能湧出奔流。故事在唐蒙開牂柯後急轉直下，

<sup>39</sup>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私撰的地志〉，《文史知識》2003年第1期，頁4-12。

<sup>40</sup>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西南夷列傳》第4冊（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116，頁2993-2994。

<sup>4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36，頁2985。

竹王作為地方勢力自然不見容於漢將，唐蒙斬下竹王的首級，卻也導致牂柯一帶少數民族的怨恨痛惜。為了平息民怨，漢廷為竹王立祠，其子封侯、死後還能配享。《漢書》視角下的夜郎是應貢而未貢的「枸醬」產地，也是臣服後可以讓漢土漫向南越的通道。《水經注》關注的卻是唐蒙「開」牂柯之前竹王的神蹟，以及他與他的臣民共同建構的信仰體系，以至於竹王死後還能以「非血氣所生」為由請求立祠。唐蒙開牂柯漫向之舉，不再只是漢帝國擴張的功業，與之相對的是竹王遭到斬首的血腥、神話的幻滅，以及夷獠咸怨、求為立祠的情緒和反應。

同樣的對比也發生樓蘭的記載裡。當樓蘭在《漢書·西域傳》裡出現時，已經是鄯善國了。班固記載了鄯善國與長安的距離、面積、戶口數、官僚體系，接著講述武帝要通大宛國因此必須拿下擋道的樓蘭的故事。當樓蘭被漢朝攻下，接下來便是一段在漢朝與匈奴之間兩面求存的艱辛。最後以漢廷派官治伊循城以為鄯善國王後盾為結局。<sup>42</sup>而在《水經注》裡，酈道元關注的是注濱河流經的伊循城，城池為何設立、河流如何作用成為敘事的核心：

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勣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勣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sup>43</sup>

<sup>42</sup>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西域傳》第5冊，卷96，頁3875-3879。

<sup>4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2，頁96-98。



寫及伊循城，是依著流入黃河的于闐河、南河，以及與南河交會的且末河、與且末河通的注濱河一路順流寫來。「樓蘭王不恭于漢」一直到「遂置田以鎮撫之」是出自《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下文索勤(?-?)屯田卻才是酈道元著力發揮處。《漢書》沒有寫明漢廷如何在西域屯田積粟，索勤的故事卻補足了這道空白。索勤為刺史毛奕(?-?)要求，帶了酒泉、敦煌一帶的軍隊，再號令三個西域國家鄯善、焉耆、龜茲也派兵來注，作出了「橫斷注濱河」這樣與大自然爭勝、與河流爭地的壯舉。酈道元詳細描述河斷當日的壯闊和激烈：水勢激烈幾乎要沖斷堤防，索勤厲聲喝斥，援引了王尊(?-?)、王霸(?-59)和耿恭(?-?)故事，再親自進行禱祀。<sup>44</sup>注濱河卻沒有屈服，於是索勤便排列兵陣、鼓譟、朝河流叫陣，向水流刺擊、射箭，將河流當作有形的敵人後，注濱河終於在三天後依著人類的意志改變了流向。胡人因而敬服，漢人也順利地在伊循城屯田三年，收穫了大量的糧食，也以自然都不可逆的力量威服了西域各國。伊循城不但是樓蘭故城，更是樓蘭國王向漢帝國臣服的標記。當注濱河水流被截斷，河水洶湧奔騰幾乎潰堤之際，索勤號召的是漢文化裡傳承下來的愛民與忠君應當要使水神服從。當水神不服，繼之而起的策略就是以軍力壓制。對著河水排兵布陣、鼓譟、拿武器戳刺、射箭，「大戰三日」的描寫看起來雖然荒謬，事實上卻達到了水流回減的勝果。不但胡人稱神、讀者也不禁嘖嘖稱奇。然而回想前文「樓蘭王不恭於漢，霍光遣人殺之」的描述，漢帝國治理河川的手段和管理轄下屬國何嘗不是如出一轍。當德澤的號召無用，接下來憑恃的就是武力。索勤治河，徵召的是鄯善、焉耆、龜茲三國的數千士兵；霍光(?-西元前68)治人，立的是樓蘭新王，如臂使指地命他管理樓蘭國民。樓蘭國獻上位於西域的伊循城，索勤設堤斷流，銳意經營的則是與地景不合的

<sup>44</sup> 王尊是西漢成帝(西元前33-西元前7在位)時的東郡太守，任內遇上瓠子決口，他為了阻止水患，導請以身填堤，水果然齊足而止；王霸則在伴隨光武帝劉秀(25-57在位)征戰時，為免動搖軍心，假稱滹沱河已然堅冰可渡，河流果然應聲合攏讓劉秀順利逃走；耿恭是東漢明帝(57-75在位)時駐守金蒲城的戊己校尉，和匈奴在疏勒城大戰時，由於匈奴人斷了通往疏勒城的河道，他便以「漢德神明，豈有窮哉」祝禱後向井再拜，果然泉湧，參〔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趙尹韓張兩王傳》第4冊，卷76，頁3237-3238；〔南朝宋〕范曄：《銚期王霸祭遵列傳》、《耿弇列傳·國弟子恭》，收於〔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西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3冊(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20，頁735；卷19，頁720-721。

農耕事宜，更達到了「積粟百萬」的成果。「威服外國」的結論因而顯得意味深長，索勤與注濱河大戰三日的神蹟顯示的是漢朝的兵力連自然的力量也能征服，何況西域各國，當然也只能俯首。

索勤屯田之事只存於《水經注》中，索勤和毛奕更於正史無聞。因此何焯（1661-1722）、全祖望（1705-1755）都認為是「無可考」、「以為誣」，楊守敬（1839-1915）則猜測或許事出於華嶠（?-293）、謝沉（?-?）等人今已亡佚的後漢史書。<sup>45</sup>當代學者試圖從敦煌、樓蘭當地出土的文書考察這段歷史，在重建史實的過程中他們同樣注意到索勤屯田事「奮激昂揚、克服困難的剛毅精神」是這段故事得以流傳的關鍵，以及由王尊、王霸、耿恭再到索勤呈現的一種以人文與水文對話、較勁、最終扭轉自然的信念。<sup>46</sup>藉由兩處《漢書》和《水經注》的對比，會發現《水經注》記載異事固然肇因於南朝地志以逸聞為風俗的新視角，但酈道元的取材與描述目的不在於獵奇，因為比起事件本身，他更著力凸顯事件所渲染的或是臣民「咸怨」，或是與自然爭勝、「威服」外國的情感。關注《水經注》志怪書寫的學者多將志怪從文本語境中單獨抽出、另行彙整，<sup>47</sup>不過，如果將《水經注》所記載的異事放回行文的語境和脈絡，會發現雖然《水經注》記錄了許多異事、記遊和域外的印度宗教傳說，但酈道元援引這些材料的「新奇」不是為文的重點，而是化俗為雅、化特殊經驗為普世共情的刻意安排。異事、異物之「異」，反而成為烘托所描述地點的重要元素，並成為遺跡的文獻徵驗。因此，引自《徐州地理志》的徐偃王（?-?）降生神話，酈道元強調的是徐王敗於楚後「百姓隨者萬數」、「山上立廟，民人請禱」的德行。<sup>48</sup>焦泉流經天門山上一處無名的石泉，「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因此山居者常以此為飲，要凸顯的是這「四面嶮絕，無由昇陟」的高山上民生不便，只有有志求道者才能居於此處，忍受「給養難周」的處境。<sup>49</sup>因而這神祕的生生之泉就恍如大自然給予求道者的一份餽贈。不論於史有據或無名石泉，《水經注》裡著重的都是異事所反映的人情，存著一份天人相應的溫厚良善。

<sup>45</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2，頁98。

<sup>46</sup> 參李寶通：〈敦煌索勤樓蘭屯田時限探蹟〉，《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頁74；王子今：〈說索勤樓蘭屯田射水事〉，《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頁76。

<sup>47</sup> 參任松如編：《《水經注》異聞錄》；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

<sup>4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8，頁786-788。

<sup>49</sup> 同上註，卷9，頁806-809。

這種以異事動人情的書寫角度、將異事與河流走向結合的技巧，在黃河首尾兩則母乳故事可見端緒。如〈河水注〉卷 1 記載印度一處名為「放弓仗」的高塔、卷 5 則述及了廩延故城。兩處地景都有一位母親，因著與兒子的親情而突然噴出洶湧的乳汁。「放弓仗」故事原為賢劫千佛少時的經驗，《水經注》則將故事分為一胎千胞的肉球被拋於水中，為下游國王拾去；千小兒成人後即將攻打生父之國，生母自請招降；最後一部分則是生母以乳汁與親兒相認。<sup>50</sup>每一段都有一件「奇異之事」，但故事並不聚焦於「新奇」，而在於張弛有度的情節安排，以及能與讀者共鳴的情緒轉換。從肉胎被棄到對峙沙場，讀者不免為此悲劇懸心。到了最後「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的關鍵時刻，<sup>51</sup>敘事者反而舉重若輕，不直述母子相認的心情，而以兩軍交戰時毫不猶豫地放下武器，說明此刻母子雙方的交兵之險、命運之苦、相認之喜。而以猛地噴灑的乳汁作為相認憑藉的安排，也順利解開了這看似無解的險局。異事因而成了打破常規、衝破困局，並讓主角得以避開命運的戲弄、成就美好結局的關鍵。

前人往往將《水經注》恆河流域的段落視之為贅詞。楊慎（1488-1559）曾感嘆「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矣」，王世懋（1536-1588）批評「流濕之外，贅行紀異」，黃宗羲（1610-1695）譏為「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sup>52</sup>顯然都對於酈道元關注他方異土深感不以為然。雖然天竺遠在疆域之外，但人與人之間顯然有得以同情共感之端。同樣是〈河水注〉裡，藉由另一位母親的乳汁，天竺與中土便能以人情作為感通和映照的契機。卷 5「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條下，記載：「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sup>53</sup>故事

<sup>5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1，頁 27-29。

<sup>51</sup> 同上註，頁 29。

<sup>52</sup> 〔明〕楊慎：《升庵文集·《水經》序》，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7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頁 17-18；〔明〕王世懋：《王奉常集·重刻《水經》序》，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3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頁 293；〔明〕黃宗羲：《今水經·今水經序》（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頁 2。

<sup>53</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5，頁 407、413。此事應引自《宋書·朱脩之傳》：「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

中以開頭的「留」朱脩之(?-464)守城和最末的「脩之絕援」將朱脩之置於孤絕的處境，在此情境下只有深愛他的母親不受空間阻隔，依舊能與他產生連結。奇異的乳汁是母子間相互感通的象徵和記號，標舉的是母與子之間因哺乳而密切相連的情感關係。而母親的「悲憂」、乳汁的「驚」出、母親號踊等強烈的情緒表現，以及執節「不下」、今「忽」如此與「果」以其日陷沒一再增強的短促時間感，都讓簡短的異事布滿張力和轉折。本不應該湧出卻噴薄而出的乳汁，召喚的是母親與兒子之間的連結，也象徵著母親對兒子不因身分和年齡改變的深情。母親的乳汁在這兩段故事裡，可以衝破人為的欺騙和阻絕，也能跨越家中和戰場的距離。放弓仗塔與廩延故城，一北一南的兩地，佇立在黃河的一首一尾兩端，因著兩對母子之間的情誼而有了雋永傳說。

不論是竹王神話、索勤斷河或乳汁認母、知兒必沒，單獨抽出這些故事來看，確實都是令人嘖嘖稱奇的異事。然而，如果將這些故事放回酈道元注疏的語境，這些異事成為人與人之間產生衝突、對抗、拉鋸乃至和解的過程裡，使之更為鮮明生動的關鍵，也使得每一處異事的發生地都有了反覆咀嚼吟詠的滋味。當恆水潺潺東流，流經毗舍利城時，他要讀者看見一座名為放弓仗的塔，是千小兒終於與生母相逢，能飲一口母愛生成的乳汁，因而放下兵刃不再征伐的地方。當黃河流經滑臺城之南一座早已棄置的舊城，酈道元卻要讀者駐足靜聽朱脩之與其母，城池不能擋的共鳴，使得這座無名舊城在文獻中閃閃發光。這些常理難以解釋的神蹟奇遇，成就河水流經的每一處的意義，因為有人群、有故事，河流的流動、蜿蜒和交錯不只是自然規律的運作，而是人們生長、存活、廝殺、感應的生存印記，在酈道元依照河道蜿蜒重新鋪排的軼聞掌故裡，地理志不再是正史的附庸，因為每一處景觀都經由自然、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與變遷產生意義。人與人之間洶湧的情感使得異事不再是脫離日常的奇聞述異，而是證成地景值得被銘記的價值所在。

---

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水經注》的引文裁去脩之被圍的慘況和之後脩之在北地安居，又光榮返國的後情，只聚焦在朱母痛子之慘、母乳驚出之奇，與千小兒認母事正可前後相應，參〔南朝梁〕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列傳三十六·朱脩之》第3冊（臺北：鼎文書局，1960年），卷76，頁1969。

#### 四、剪裁與挑選：引述文獻與預設讀者的對話

由前述異事書寫的例子可知，《水經注》收錄的各地奇聞雖然受到南方地志的影響，但酈道元卻從中為異事書寫煥發新意：奇異的事件加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張力，以人物在自然之間的活動展現地景的魅力。而從《水經注》對《史記》、《漢書》、《宋書》和佛教故事的吸收、援引、裁切與轉化，會發現酈道元引述前代文獻時仍有書寫者的判斷和取捨。不論是作為地理志的內涵抑或作為注疏的形式，既有文獻都是《水經注》引介各地風土時的重要材料，因此引述文獻向來是《水經注》研究的一大主題。前人已經注意到酈道元的旁徵博引，不但服膺於地志和注疏的傳統、豐富了《水經》的內涵，也具有中古地志保存之功。然而，正如南方地志的異事書寫在《水經注》生長出了新意義，書裡的引述文獻也不是僅是於古有據的依託和佐證。酈道元筆下的夜郎、樓蘭、放弓杖、廩延故城透過行文時細膩的鋪陳描繪，展露了情感的張力和人與自然的相應。而爬梳《水經注》所引述的文獻，會發現史實帶來的共鳴和迴響不僅仰賴作者的筆力，也依託於作者與讀者之間共通的知識、記憶，以及對史實的詮釋角度。

正如《〈水經注〉序》裡新勾勒的地理學範疇、號召地志使用者與書寫者，地理志的內涵在掙脫了統治、實用為唯一目的後，有了更豐富的可能。酈道元以地景為主軸、史實為佐證的寫作策略，對焦的是一批關心地理書寫、具有一定知識水準的讀者。因此，他可以依照河水的流向，鋪陳景點及相關歷史事件的出場順序，確信讀者可以在「在此地」、「在此處」的提示用字裡與他同感歷史的浩瀚、人物的興衰，對著紙上所述及景點撫今追昔。例如：易水餞別、季札墓、劉邦任亭長的泗水亭、劉備三顧的孔明舊宅都是一句「即此處」帶過。<sup>54</sup>不僅於歷史大事件如此，於小事也如此。當連水流經當城故城時，以一句「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即此處也」就說盡了當城的意義。<sup>55</sup>周勃（?-西元前 169）和陳豨（?-西元前 196）不過都在《水經注》中出現兩次，沒有講述生平，也沒有平定代國、斬陳

<sup>54</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11，頁 1041-1042；中冊，卷 29，頁 2059；中冊，卷 25，頁 2142；下冊，卷 28，頁 2366。

<sup>55</sup> 同上註，中冊，卷 13，頁 1169。

豨的原因和描寫。<sup>56</sup>顯然在酈道元的設想下，這些史事都屬於讀者的先驗知識，無須仰賴一本地志加以說明。酈道元預設的讀者除了熟知歷史，還是一批關注地理文獻的人。因此「即此處」的描述常常高度仰賴對地理文獻的認識，例如：〈鮑丘水注〉講述當地的溫泉，就以一句「《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作結；〈穀水注〉則以臯門和金鏞城驗證潘岳（247-300）的〈西征賦〉和《晉宮閣名》；〈陰溝水注〉以垂惠聚呼應了袁山松的《郡國志》。<sup>57</sup>酈道元以不同體裁的地理志驗證地域不同、景觀各異的地點，固然是以既有文獻考證所述；同時，簡要的一句「即是某書中某地」，面向的也是一群熟稔地理著述的讀者，不必仰賴作者說解、闡釋，便能領會此處的記載價值和文獻淵源。《水經注》不僅記載簡略，還會打散人物生平的時間線，目的在於顛覆史實和地景的主次，讓史實為景點增色。例如：公孫瓚（?-199）的生平被分成 8 段、分屬 6 卷，與劉虞（?-193）之間的恩怨被分列於易水、灤水、鮑丘水三處，寫完烏桓為劉虞報仇之事後，才述及公孫瓚於劉虞麾下受命攻打張純（?-189）事。<sup>58</sup>對趙襄子的記載更可以看出酈道元如何打散、化用引述文獻，仰賴對預設讀者的理解和信任，讓歷史事件為地理景觀增添打動人心的細節。趙襄子是春秋時代晉國六卿之一，他對權力的步步為營導致三家分晉，成就了之後的趙國。《左傳》對於趙氏的記載相當豐富，而在《史記·趙世家》裡也給趙襄子的生平不小的篇幅。據《左傳》、《史記》的記載大致可以勾勒趙襄子的人生軌跡：趙襄子（約?-西元前 443）是趙簡子（約?-西元前 476）的庶子，雖然出身卑微，卻憑藉著才幹在一干兄弟中脫穎而出，取代了世子伯魯（?-?）。他獲得簡子賞識的關鍵在於看出簡子的野心，不顧親姊為代國夫人而設計誘殺了代王，為趙氏擴大了代北一帶的勢力範圍。襄子另一個重要事蹟是與智

<sup>56</sup> 〈渭水注〉稱成國故渠經周勃冢、〈渠沙水注〉稱陽夏縣故城為陳豨侯國，參〔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中冊，卷 19，頁 1625；卷 22，頁 1903。

<sup>57</sup> 同上註，中冊，卷 14，頁 1233；卷 16，頁 1383、1386；卷 23，頁 1952。

<sup>58</sup> 〈河水注〉引《後漢書》稱瓚破黃巾於殷河；〈淇水注〉引《英雄記》述瓚破黃巾賊後，敗於袁紹（154-202）將麴義（?-?）於界城橋，又稱瓚破黃巾後沿清河追敵入海新首 3 萬；〈易水注〉引述公孫瓚害劉虞後當地的童謠；〈巨馬河注〉指瓚敗袁紹將崔巨業（?-?）於巨馬水；〈濕餘水注〉回述卷 9 瓚敗於麴義事，稱瓚後引易荊水屯守易京；〈鮑丘水注〉續卷 11 瓚害虞事，稱烏丸為虞復仇，破瓚於鮑丘水上，又於灤水流經的石門峽稱此處為瓚於劉虞轄下時破張純處，參同上註，上冊，卷 5，頁 451-452；卷 9，頁 870-871；卷 11，頁 878；中冊，卷 12，頁 1040-1115；卷 14，頁 1115、1206、1222、1234。

伯(約?-西元前 453)爭權,策反原先支持智氏的韓、魏,使智伯戰敗身死,形成三家分晉的鼎足之勢。智伯之死還留有一個慷慨激昂的餘韻,智伯門客豫讓(約?-西元前 453)「以國士報之」,不惜吞炭漆身也要刺殺趙襄子復仇。<sup>59</sup>

《水經注》在述及上述史事時,沒有按照時間線,而是依據河水流向引導一個又一個的歷史事件登場。從第 6 卷的〈汾水注〉到第 13 卷的〈灑水注〉,趙襄子的人生被切成 9 段、分屬 6 卷、6 條不同的河道。酈道元第一次提到趙襄子在〈汾水注〉「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下提到「(汾水)水上舊有梁,青荊殞于梁下,豫讓死于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sup>60</sup>這條注結合了《呂氏春秋·序意》和《史記·刺客列傳》提到的故事。在汾水上曾經有過汾橋,趙襄子經過這裡時馬不進,〈序意〉裡記載襄子命青荊(?-?)前去查看,他發現了躲在橋下的豫讓。由於豫讓和青荊是故友,青荊忠義不能兩全而自殺。〈序意〉的故事只說到青荊之死,沒有襄子解衣、豫讓自盡。〈刺客列傳〉則沒有青荊的戲分,而是讓襄子「使人問之」,發現了豫讓後,為了全豫讓報仇之志,趙襄子解下外衣讓豫讓以劍擊三下,豫讓隨即伏劍自殺。<sup>61</sup>通過對兩個文獻出處的化用,汾水之上的橋梁承載了青荊、豫讓和襄子三人之「死」,也讓綿延多年的晉國諸侯內鬥終於有所了結。青荊的忠義兩全、豫讓的國士之報、襄子的成人之美也都藉由汾橋而有所見證。

汾水流過晉陽縣東之後,繼續往南流過冠爵津,進入河東郡界,首先流過永安縣的西邊,又流過了歷唐城東。汾水在此處和彘水相會,彘水源出於岳陽,往溪流經觀阜的北邊。在此處,為了解釋「觀阜」之名,酈道元第二次提到了趙襄子。原來,當趙襄子與智伯對抗的過程中,趙氏侍臣原過(?-?)得到了天使的竹書,聲稱它將會幫助趙襄子打贏智伯,條件是趙襄子要在此處為它立祠。後來趙襄子果然遵守約定,並讓原過主持祭祀,此處便從百邑更名為觀阜。<sup>62</sup>「原過受竹書於王澤」是這段神異故事

<sup>59</sup>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刺客列傳》第 3 冊,卷 86,頁 2521。

<sup>60</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29-531。

<sup>61</sup>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刺客列傳》第 3 冊,卷 86,頁 2521。

<sup>62</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42-546。

的開頭，<sup>63</sup>酈道元卻一筆帶過，將重點放在趙襄子齋戒三日、剖竹讀信、遵命立祠的情節。原過受竹書的故事則列於〈澮水注〉中：「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于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為我遺無卹』。原過受之于是澤，所謂王澤也。」<sup>64</sup>原過跟隨襄子的途中經過王澤，三個一見即知非人的神祕人士遞給他兩個竹節。竹節的內容，就是前引〈汾水注〉裡以擊敗智伯交換立祠的約定。〈澮水注〉裡沒提到原過送竹書之後的結果，讀者卻知道趙襄子最終贏得勝利，還瓜分了晉國，一躍從六卿成了趙國國君。「王澤」之名因而其來有自、當之無愧。

而在立祠與遇神之間，酈道元先插入了智伯與趙襄子之爭的最後結局：「晉獻公滅耿，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為三晉，此其一也。」<sup>65</sup>酈道元依照經文先將汾水寫完，才寫最終流入汾水的澮水，因此他在汾水流經了皮氏縣南邊，接著流經耿鄉城北時，將時間線拉回趙襄子三家分晉的立基：此處是獻公（西元前 677-西元前 651 在位）滅耿國後封給襄子祖先趙夙（?-?）的封地。酈道元寫完汾水流入黃河後，依經文，另起澮水從河東的東高山發源一段，又先插敘趙、智相爭導致水患之事：流入澮水的絳水曾經被智伯率領韓、魏引水灌晉陽，讓趙襄子蒙受重大的損失。接著才在澮水最終於王澤處注入汾水時，寫到原過的神奇經歷。到了王澤此處，酈道元總算解釋了趙襄子受竹書居然是在智伯水淹晉陽、襄子奔保這樣狼狽而絕望的時刻。<sup>66</sup>

酈道元第六次提到智、趙爭鋒，已經由北往南依次寫完了涑水、文水、原公水這 3 條最終入汾的河流，接下來提到同樣入汾水的洞過水之時。洞過水流經了渝次縣南向西還未流到晉陽縣，水邊有鑿臺，正是水淹晉陽後韓、魏反叛智氏，和襄子聯手殺了智伯瑤「剖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sup>67</sup>在明示智伯之死後，下一條晉水流經晉陽縣時他又在「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下再一次注了智伯水淹晉陽之舉，並在《水經》下一句「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注解了智伯水淹晉陽所壅塞使水上溯的水道就在此處。<sup>68</sup>到

<sup>63</sup> [北魏] 酈道元注，[清] 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46。

<sup>64</sup> 同上註，頁 573。

<sup>65</sup> 同上註，頁 562。

<sup>66</sup> 同上註，頁 565、568、573。

<sup>67</sup> 同上註，頁 604。

<sup>68</sup> 同上註，頁 608-609。



了酈道元書寫當下，智氏故瀆已成為沼水北脈，反而有助於晉陽城灌溉之用。<sup>69</sup>由此可見世事無常。《水經注》最後一次提到趙襄子，則是卷 13〈灤水注〉提及雞鳴山時引述趙襄子騙殺代王導致其姐代趙夫人自殺之事。趙襄子騙殺代王是他生涯早期的亮眼戰績，他正是憑藉此役受到父親簡子的賞識。在酈道元筆下，卻因為代趙夫人之死發生在代、趙邊界的雞鳴山而被置於流經代北一地的〈灤水注〉中，而非與其他襄子事蹟一般於廣義的汾水流域書寫。<sup>70</sup>

由上述 9 段故事可以看出，趙襄子的生平被酈道元割裂、置放在不同的地點。時序被打散，情節和因果未必清晰，在什麼時候說哪些故事一概取決於地理景點。於是，趙襄子晚期解衣與豫讓的故事在最前，與智伯的爭鬥在中，中間又插入三家分晉的結局，水灌晉陽一事更是依據遺跡位置的不同分了 3 次書寫，最後才述及早年騙殺代王之事。由《左傳》和《史記》引述而來的趙襄子事蹟依酈道元述及的不同景點被剪裁、割裂、拆分，並未集中筆力刻畫趙襄子奮勇爭鬥的生命歷程。相反的，他藉由春秋時期趙氏內部、乃至晉國內部的廝殺、角力、爭鋒烘托出《水經注》所聚焦的地景。原來值得銘記的景點不一定是南方遊記裡的崇山奇石、不一定是都城賦裡的苑囿樓宇，一處橋樑、一片原野、一段壅塞的水道，因著趙襄子的爭雄傳奇而有了歷史的厚度和力量。趙襄子的生命歷程不止被割裂，也與同一景地的其他史事、景觀結合，渲染出戰爭酷烈、滄海變換的無常。依託著讀者對古代典籍、對趙襄子的生平經歷的熟習於心，酈道元在引述文獻時因而能夠看似破碎、實則精準地化用史籍。

史實和地景究竟該怎麼安放在地志中，是許多地志作者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如：常璩《華陽國志》就選擇先寫地方史、再寫地景風俗。<sup>71</sup>這也顯示出《水經注》割裂史實的作法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酈道元依循著《水經》的結構、也按照河流真實的流向一一說解沿岸的地景，即使是大篇幅地引述前代文獻，也有以「水流」貫徹、以地景為核心的安排。既有的史

<sup>69</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609-610。

<sup>70</sup> 「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于山側，因名之為磨笄之山，未詳孰是？」同上註，中冊，卷 13，頁 1182。

<sup>71</sup> 第二節曾經討論過地方史和地方志的拉鋸關係，《華陽國志》和《水經注》選擇了兩種不同的作法，參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增訂本）》，頁 93-96。

料在他的裁切、鈔變之下，有了不同的偏重。例如：卷 19〈渭水注〉引述了《史記·五宗世家》和《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臨江王劉榮(?-西元前 148) 故事。<sup>72</sup>當渭水流經霸上，「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注之」下酈道元有注，<sup>73</sup>稱霸水從藍田谷湧出，往北流經藍田川時，川旁有漢代臨江王劉榮之冢。酈道元將《史記》、《漢書》故事鈔變如下：

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中尉鄧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于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禱之。<sup>74</sup>

由《史記》、《漢書》到《水經注》，劉榮故事從人物生平轉換為漢臨江王榮冢此一地理景觀的註腳。《水經注》裁掉了劉榮本為太子、廢為臨江王的政治意義，添上「川有漢臨江王榮冢」和「葬于是川」的地方感，甚至特意將劉榮「葬藍田」改寫為「葬於于川（藍田川）」。讓河流成為主角、藍田川成為劉榮故事被誘發、被號召、被講述的主因。《史記》、《漢書》點明了劉榮被景帝（西元前 157-西元前 141 在位）徵召入京的原因是「坐侵廟儒垣為宮」，<sup>75</sup>《水經注》則以一個「罪」字帶過。史書運用了「既上車」、「軸折車廢」的時間感和細節，以及父老「流涕竊言」的驚惶不安，<sup>76</sup>渲染異象的玄妙奇異；《水經注》則簡單歸結為「車軸折」、「父老泣曰」，隨即將場景帶往劉榮進京受到訊問的情節。原文裡的「責訓」，到了酈道元筆下成了「急切責王」，臨江王罪行的淡化和中尉問責情緒的強化，此消彼長之

<sup>72</sup> 《史記》、《漢書》的記載大致相同：「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禱之。」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家》第 3 冊，卷 59，頁 2094；〔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 3 冊，卷 53，頁 2412。

<sup>73</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中冊，卷 19，頁 1602。

<sup>74</sup> 同上註，頁 1606。

<sup>75</sup> 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家》第 3 冊，卷 59，頁 2094；〔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 3 冊，卷 53，頁 2412。

<sup>76</sup> 同上註。

下，劉榮的無辜和委屈被凸顯出來。酈道元將班、馬簡要的「王恐」，<sup>77</sup>增添了「王年少」的細節，強調劉榮的年輕和恐懼：他的自殺並非畏罪，而是無辜受罰、官吏峻急問罪乃至年少不知事的結果。於是，飛燕銜土、百姓矜之從《史記》、《漢書》裡與「既上車，軸折車廢」的凶兆、「父老流涕竊言」的預言並列的異事，轉而成為對劉榮無辜受罪、因年少而驚恐自盡的撫慰和憐惜。比較史書和地志之間書寫重心的轉換，可以看出酈道元在引述史料時仍有自主的偏重和調整。

《水經注》的所引文獻不只有細微處的增刪和調整，也顯示出有意識的節略。例如：在卷 40〈漸江水注〉提及嶠嵎一帶的勝景時，酈道元引用謝靈運（385-433）的〈山居賦〉：

北則嶠山與嵎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sup>78</sup>

酈道元對此地美景的描寫符合全書一貫以四字句寫景的文字風格，並以王元琳（349-400）的論述、謝康樂的書寫印證。對於嶠嵎美景的敘述雖然簡略，卻不失美感，在指路〈山居賦〉之餘也能顯示酈道元自己的文字功底。鄭毓瑜認為，謝靈運〈山居賦〉顯示出他所開啟的一種以連類譬喻指稱、描述山水的書寫方式，也體現了魏晉到南朝地志之間一種新的介入山水的模式。不同於魏晉地志裡多以抽象性、需要倚靠讀者想像的疊詞來描述眼前風光，謝靈運〈山居賦〉運用了許多動詞，如：登、臨、經、見、拔取、摘除、砍伐等，讓人物進入山水景物之間，以身體的動作具體展現人對自然的施作和影響，地方和物類之間的關係是經由人類的身體行動來完成的。<sup>79</sup>而在酈道元的引述和剪裁裡，他沒有全然援引謝靈運的新技法，而是更致力於醞釀出一種「神明境」的氛圍。景物的動感透過「懷」、「引」、

<sup>77</sup> 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家》第3冊，卷59，頁2094；〔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3冊，卷53，頁2412。

<sup>78</sup>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40，頁3330。

<sup>79</sup> 鄭毓瑜：〈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347-390。

「吹」、「風」、「觸」、「延」等動詞在煙霧溪峰之間靈活的躍動，呈現山峰相連的綿延、往返、勾連。而煙霧繚繞的景色如「澗」、「煙」、「霧」、「馨」不但是對氤氳山景的如實描繪，其柔軟濕潤的質地也幫助懷、引、吹、風、觸、延等延伸展開的動作成為可能。山峰相連、山澗煙霧繚繞的景象是他述及嶠山和嵯山必須保留、強化的重點，為王元琳的「神明境」之說做了具象的描摹，也是他為讀者設想最需要獲知的訊息。同時還能作為指示的路標：那些「除榛伐竹，抽笋自簞」的身體動態與人為施作都留在〈山居賦〉的原文裡，<sup>80</sup>提供給有興趣進行深入閱讀的讀者。

田曉菲論及中古行旅記遊時指出，「紀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留守在家的聽眾」，<sup>81</sup>遊記的作者往往是為「沒有去的人」所寫的，因此每一筆鉅細靡遺的勾勒、每一次與歷史掌故或家鄉風土的比附，都是作者試圖拉近讀者與異地距離、解消陌異感的嘗試。由這個角度省視《水經注》裡眾多的引述文獻，就不僅是基於地理文獻的積累或依經作注的慣習，而是一次又一次藉由讀者所熟知的文獻、史實、典故、名篇說解那些讀者未能親見的景點。而這些史料也同時為一處原可能景色平常的地點賦予了價值和意義。而在引述前代文獻時，酈道元通過框限了一群關注地理志發展、享有共通文化傳統的讀者，因而得到了自由揮灑的創作空間。或是點出書目，將更多的闡述留為延伸閱讀；或是隨著河道蜿蜒將文獻剪裁、挪移、鈔變，流傳多年的史實逸聞或文人碰撞新環境的新奇體驗因而都成為酈道元手上靈活運用的素材，賦予景點或是觸動人心、或是發思古幽情的意義。

## 五、結論

明代性靈派大家譚元春（1568-1637）曾為文感嘆：愛好《水經注》的前輩只把它當作「考核醜記」之用，「筆如槁木」、毫無靈氣。在他看來，讀《水經注》真實的感受是「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水，舟馬相澹，若森森礚礚，麗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真僧迢迢待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sup>82</sup>書中的景物、人事、建築不僅歷歷如繪、躍然紙

<sup>80</sup>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謝靈運·〈山居賦〉有序并自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31，頁2607-1。

<sup>81</sup> [美]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69。

<sup>82</sup> [明]譚元春：《新刻譚友夏合集·刻《水經注》批點序》上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

上，還能平添讀者耳目之娛，讓人想要一窺此情此景之妙。由「麗我瞻矚」到「光我目，蒼我思」再到「可一往也」，譚元春細緻地陳述酈道元的文字如何提供了自感官到心靈的觸動力，以及自閱讀到行動的吸引力。因此，他與心意相通的鍾惺（1574-1625）一起選評《水經注》裡的段落，想讓其他讀者也看見：從《水經注》裡得來最珍貴的不是地理知識、歷史掌故，而是酈道元「囚捉幽異，掬弄光影」的巧奪天工、是「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的震蕩低迴，<sup>83</sup>引人反覆咀嚼、沉迷不已。<sup>84</sup>鍾、譚二人光目蒼思、意欲舉足提杖的時刻，正照映了數百年前酈道元撰著時嘗試不同的地志書寫方式、面向更廣大讀者群的意圖。

長期以來被歸類於史部地理類的《水經注》，一直以來列位於歷代方志之間。酈道元考證歷史、地景之詳，讓人基於分類標準之下暫時擱置了他講述的那些神異故事，以及他生花的妙筆所呈現的跌宕情節、悅目山水。而重新檢視材料及其生成的語境，或許就是考掘《水經注》時代特色與書寫意識的契機。《水經注》棄州郡縣的分類傳統，取用河道交通作為書寫主軸，同時添加了比原文更豐富的水道知識與沿岸掌故。不論與他於序言建構的地志傳統或同時代其他著作相比，酈道元的著書方式都顯得別具一格。他為什麼選擇《水經》作注，一直是學界歷來關注的問題，崔浩之獄的壓力與〈禹貢〉傳統的斷裂成為後人解讀《水經注》的切入點。時代背景雖然具有影響力，但《水經注》從序言、形式到收錄內容展現了酈道元對文體「解消作貢」、「建構傳統」的反思。〈《水經注》序〉對前代地理文獻的排序和臧否顯示出酈道元從經典、史書、辭賦等不同體裁取用地理文獻、重新建構與歸納此文類的企圖。建構了地理文獻的類別和發展史之後，「任土作貢」傳承下來的實用性和統治性不再是地理志的唯一價值，地理書寫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譬如，史實可以反過來補充地景的意義，異

---

1976年），卷8，頁333-335。

<sup>83</sup> [明]譚元春：《新刻譚友夏合集·刻《水經注》批點序》上冊，卷8，頁333-335。

<sup>84</sup> 許多《水經注》學者認為蘇軾（1037-1101）〈寄周安孺茶〉：「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是《水經注》為宋人接納喜愛的一例明證，然而亦有人考證此處「水經」是〈煎茶水記〉的別稱。考量到〈寄周安孺茶〉的主旨在於陳述飲茶之趣，突然在其中一句聲明閱讀《水經注》之樂，似乎不合常理，故不從其說，參譚家健：〈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頁11，對《水經注》接受史的彙整，以及陳勇、王亮：〈「《水經》亦屢讀」中的《水經》〉，《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頁65。

事渲染出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張力，移動的文人遇見新環境時的驚喜、讚賞和詠嘆也成為地景書寫的一環。

本文從「志怪異事」和「引述文獻」切入，這兩類材料是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並展開多元討論的，而當我們意識到酈道元重新定義了地理志之後，它們便有被置回原書脈絡討論的價值。本文探討這些異事和文獻為何選用、如何化用、又如何將其與河流水道的紀錄結合成值得被閱讀、被記憶的地理景觀。於是發現，聚焦志怪異事的紀錄並不為了追新好奇，而是藉由奇異之事突出、渲染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情誼感通，引發讀者的共鳴。而所引述的文獻也非全文照搬，而是經由酈道元之手進行刪改鈔變，仰賴具有共同文化和興趣的讀者一同品味以地理為主、史實為輔的獨特風景。從這個角度分析《水經注》，它所呈現出的地理書寫並不僅是作者個人因為才華洋溢而進行的新創之舉。而應該將《水經注》置回書寫當下的情境，顯現出「地理志」這樣的體裁從權力的具象化、知識和實用性材料的彙整，轉向以「地點」為主軸，輔以異事、傳說、詩賦、遊記的注疏方式，強調了知性和情感、美感經驗的結合。酈道元消除了以「貢」為核心的地志架構，突出人群互動在自然地景中展現的意義，顯示出他因應注疏的特性、嘗試了不同的書寫方法，號召了不受帝王、中央統治意圖所限的預設讀者，完成了從面向「統治者」轉為面向「地理書寫者」、「使用者」的改變。

出於對「山水之趣」的體察、對「尤深入人心」的感悟，酈道元藉異事書寫加劇人類情感與自然景物的張力，也透過對引述文獻的割裂、刪修、改寫，提供讀者閱讀時悅目賞心的娛樂體驗。因此，看似沒有實用價值的異事書寫，卻能因為人同此心的共鳴，而使得他方異域或無名舊城觸動人心；看似直承前人而來的引述文獻，在作者的剪裁重組之下成為有知識的文人共通的交會符碼，也在刪改之後提供了閱讀時的美感體驗。此時，再一次回望段義孚所提出的「浪漫主義地理學」的問題：歷史和地理有什麼差異呢？地理書寫能有情緒、有感性、能說出撼動人心的故事嗎？酈道元《水經注》顯然為地理志開展了觸動讀者的可能，這樣的地理志轉向展現出一種非純粹客觀、非純粹知識性、非純粹資料累積式、有敘事者聲音的《水經注》面貌。

基於對《水經注》讀者轉向的思考，異事書寫不再僅是《山海經》等博物類地志的遺緒，文獻的引述也不是遵循方志、經疏傳統，更不僅肇因

於南北間隔的替代方案。《水經注》所記述的內容因而有了全面性重新詮釋的空間：那些看似閒筆、對實地考察、今古對照無用的材料，究竟在《水經注》擔負著怎樣的任務？例如：為什麼需要記錄文字已湮沒不可識的石碑？每一個地點都聲明王莽（西元前 45-23）的更名有什麼意義？為什麼酈道元除了記錄親身經歷外還需要說明考證過程？在改變預設讀者的趨向之外，酈道元是否有更強烈地，將《水經注》置放在地理志轉型關鍵的意圖？對《水經注》內容的重新詮釋、對《水經注》歷史意義的重新省思，除了能夠更詳細梳理地志傳統的發展，也讓《水經注》不再是地理資料、奇聞軼事、詩文摘句的集合，而是作者有意識地統籌下具有美感與情感效應的新地理文獻。那麼，下一步或許就得以從文學角度出發，追問一個文學詮釋範圍的問題：當地理景觀具有被「非完全理性」詮解的可能性、當地理書寫具有情感號召的動人質地，那是否就是文學？地理志或許也能納入文學作品的範疇，以文學的眼光進行重新詮釋。

【責任編校：黃佳雯、朱怡璇】

## 徵引文獻

### 專著

- 〔西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劉宋〕裴駙 Pei Yin 集解，〔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Xinjiaoben shiji sanjiazhu bing fubian erzhong* 第 3、4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1 年。
- 〔東漢〕班固 Ban Gu 著，〔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Xinjiaoben hanshu bing fubian erzhong* 第 2-5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6 年。
- 〔東晉〕常璩 Chang Qu 著，任乃強 Ren Naiqiang 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Huayangguo zhi jiaobu tu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南朝宋〕范曄 Fan Ye 著，〔唐〕李賢 Li Xian 等注，〔西晉〕司馬彪 Sima Biao 補志，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Xinjiaoben houhanshu bing fubian shisanzhong* 第 3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1 年。

- 〔南朝宋〕劉義慶 Liu Yiqing 著，〔南朝梁〕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余嘉錫 Yu Jiayi 箋疏：《世說新語箋疏》*Shishuo xinyu jianshu*，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84 年。
- 〔南朝梁〕沈約 Shen Yue 著，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Xinjiaoben songshu fu suoyin* 第 3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0 年。
- 〔南朝陳〕顧野王 Gu Yewang 著，顧恒一 Gu Hengyi、顧德明 Gu Deming、顧久雄 Gu Jiuxiong 輯注：《輿地志輯注》*Yudi zhi j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 〔北魏〕酈道元 Li Daoyuan 注，楊守敬 Yang Shoujing、熊會貞 Xiong Huizhen 疏：《水經注疏》*Shuijing zhushu* 上、中、下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89 年。
- 〔北齊〕魏收 Wei Shou 著，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魏書》*Wei shu*，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0 年。
- 〔唐〕劉知幾 Liu Zhiji 著，〔清〕浦起龍 Pu Qilong 通釋，王煦華 Wang Xuhua 整理：《史通通釋》*Shitong tong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著，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Xinjiaoben suishu fu suoyin* 第 2 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80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太平御覽》*Taiping yula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5 年。
- 〔明〕王世懋 Wang Shimao：《王奉常集》*Wang Fengchang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133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 年。
- 〔明〕黃宗羲 Huang Zongxi：《今水經》*Jin shuijing*，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69 年。
- 〔明〕楊慎 Yang Shen：《升庵文集》*Shengan wen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Wenlange qinding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307 冊，杭州 Hangzhou：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chubanshe，2015 年。



- [明]譚元春 Tan Yuanchun:《新刻譚友夏合集》*Xinke Tan Youxia heji* 上冊，臺北 Taipei：偉文圖書出版社 Weiwen tushu chubanshe，1976年。
- [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第2冊，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3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 shanggu sandai qinhan sanguo liuchao wen* 第3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1年。
- 不著撰人 Buzhao zhuanren:《斷句十三經經文》*Duanju shisanjing jingwen*，臺北 Taipei：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1991年。
- 王庸 Wang Yong:《中國地理學史》*Zhongguo dilixu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1984年。
- 田餘慶 Tian Yuqing:《拓拔史探（修訂本）》*Tuoba shi tan (xiudingben)*，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shi sanlian shudian，2011年。
- 任松如 Ren Songru 編：《《水經注》異聞錄》*Shuijing zhu yiwenlu*，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1991年。
- 胡阿祥 Hu Axiang 等：《魏晉南北朝十五講》*Weijin nanbeichao shiwujiang*，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0年。
- 胡寶國 Hu Baoguo:《漢唐間史學的發展》*Hantang jian shixue de fazh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03年。
- 范文瀾 Fan Wenlan:《《水經注》寫景文鈔》*Shuijing zhu xiejing wenchao*，《范文瀾全集》*Fan Wenlan quanji* 第6冊，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2年。
- 倉修良 Cang Xiuliang:《方志學通論（增訂本）》*Fangzhixue tonglun (zengdingben)*，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3年。
- 陳橋驛 Chen Qiaoyi:《《水經注》研究》*Shuijing zhu yanjiu*，天津 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1985年。
- ：《酈道元評傳》*Li Daoyuan pingzhuan*，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1994年。

- 鄭毓瑜 Cheng Yuyu：《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  
*Wenben fengjing: ziwo yu kongjian de xianghu dingyi (quanxin zengdingban)*，  
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14 年。
- 鄭德坤 Zheng Dekun：《《水經注》故事鈔》*Shuijing zhu gushichao*，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4 年。
- 鮑遠航 Bao Yuanhang：《《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Shuijing zhu  
yu weijin nanbeichao dili wenxue wenxian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9 年。
- 〔美〕田曉菲 Tian Xiaofei：《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  
寫作》*Shenyou: zaoqi zhonggu shidai yu shiji shiji zhongguo de xingli  
xiezu*，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  
sanlian shudian，2015 年。
- 〔美〕段義孚 Tuan Yi-fu 著，趙世玲 Zhao Shiling 譯：《浪漫主義地理學：  
探索崇高卓越的景觀》*Langman zhuyi dilixue: tansuo chonggao zhuoyue  
de jingguan*，臺北 Taipei：立緒出版社 Lixu chubanshe，2018 年。
- Robert Ford Company,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子今 Wang Zijin：〈說索勸樓蘭屯田射水事〉“Shuo Suomai loulan tuntian  
sheshui shi”，《甘肅社會科學》*Gansu shehui kexue* 2013 年第 6 期。
- 李嘉言 Li Jiayan：〈北朝的三部散文著作〉“Beichao de sanbu sanwen zhuzuo”，  
《開封師院學報》*Kaifeng shiyuan xuebao* 1962 年第 1 期。
- 李寶通 Li Baotong：〈敦煌索勸樓蘭屯田時限探蹟〉“Dunhuang Suomai loulan  
tuntian shixian tanze”，《敦煌研究》*Dunhuang yanjiu* 2002 年第 1 期。
- 杜培響 Du Peixiang：〈從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風的融合——以《水經注》  
和南朝山水小品為例〉“Cong nanbeichao shanshui sanwen kan nanbei  
wenfeng de ronghe: yi *Shuijing zhu* he nanchao shanshui xiaopin weili”，  
《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Huabei dianl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2010 年第 5 期。
- 胡寶國 Hu Baoguo：〈魏晉南北朝私撰的地志〉“Weijin nanbeichao sizhuan de  
dizhi”，《文史知識》*Wenshi zhishi* 2003 年第 1 期。

張蓓蓓 Zhang Beibei :〈由《水經注》看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You *Shuijing zhu* kan Li Daoyuan de rendao renwen guanhuai”, 《成大中文學報》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29 期, 2010 年 7 月。

陳勇 Chen Yong、王亮 Wang Liang :〈「《水經》亦屢讀」中的《水經》〉“*Shuijing yi lüdu' zhong de Shuijing*”, 《文學遺產》 *Wenxue yichan* 2006 年第 1 期。

劉苑如 Liu Yuanru :〈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Jian yu bujian de zhanzheng: lun jiti yu futi ji Liu Yu beifa”,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49 期, 2016 年 9 月。

聶早英 Nie Zaoying :〈北魏前期的漢人士族與拓拔統治者〉“Beiwei qianqi de hanren shizu yu Tuoba tongzhizhe”, 收入劉心長 Liu Xinchang、馬忠理 Ma Zhongli 主編：《鄴城暨北朝史研究》 *Yecheng ji beichaoshi yanjiu*, 石家莊 Shijiazhuang :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1991 年。

譚家健 Tan Jiajian :〈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Shilun *Shuijing zhu* de wenzhe chengjiu”, 《文學遺產》 *Wenxue yichan* 1982 年第 4 期。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 Alan K.L. Chan and Yuet-Keung L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Yu-yu Cheng, “Text and Commenta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 ed.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學位論文

陳識仁 Chen Zhiren :《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 *Beiwei xiushi shiye yu Shuijing zhu de xingcheng*,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lishi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 1999 年。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s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2014.